

抗战时期饮河诗社旧体诗创作论

付冬生 姚佳汛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抗战时期,重庆凭借其特殊的地缘、文化与政治地位,成为全国抗战文化中心。饮河诗社即诞生于这一历史语境,迅速发展为抗战大后方规模最大的文人社团。聚焦于民族危难背景下饮河诗社的文学实践,探讨其在抗战宣传、文化传承与旧体诗创作中的独特功能,核心问题在于:诗社如何承续“诗言志”传统,以旧体诗抒写家国情怀?其作品在艺术风格、思想内涵与文化功能层面呈现出何种创新?采用文献研究法,以《饮河集》为核心文本,辅以相关档案、诗集与史料,梳理诗社的活动脉络与创作实绩;运用比较分析法,参照同期其他文学团体,凸显其特质。研究发现,饮河诗社通过雅集唱和及《饮河集》的持续刊行,构建了一个兼具文学性与政治性的文化共同体。其旧体诗创作不仅表现出鲜明的“山城意象”,生动再现战时重庆的地理景观与人文风貌,更在精神气质上接续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强化了诗歌的现实指向与历史厚重感。尤为突出的是,诗社深化“学人之诗”传统,将学术素养与家国情感熔铸于诗笔,作品兼具学理深度与艺术感染力,体现出多元融合的审美取向。饮河诗社的文学实践,不仅拓展了抗战文学的表现形式,更在文化层面维系了民族精神命脉。

关键词:抗战时期;饮河诗社;旧体诗;山城意象;诗言志;学人之诗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6-0131-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612

抗战爆发后,诗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全国有明确成立信息的诗社约40个,旧体诗社约32个。饮河诗社因其广泛的影响力,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诗社之一。饮河诗社创办于1940年,是战时重庆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的文人社团之一,囊括众多“渝漂”名家,影响广泛,极具代表性。饮河诗人以笔为剑、以诗为旗,记录时代、抒写家国,其作品既彰显传统文化在战火中的坚韧生命力,亦焕发出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遗憾的是,学界对饮河诗社的系统研究仍显薄弱,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聚焦社员书法艺术,如王冰茹《章士钊书法研究》、王贞华《许伯建与潘伯鹰的翰墨情谊》、俞栋《许伯建:从银行练习生到文人大书法家》等,多停留于风格评述,虽偶及“诗书一体”,却缺乏文本与笔墨互动的深层分析。其二,关于诗社发展脉络,以许伯建、唐珍璧《饮河诗社史略》、马拉《抗战时,重庆有个饮河社》和黄宇星、王志昆《饮河诗说》等为代表,多为概略叙述,对结社动因、组织机制、社员变迁及《饮河》《饮河集》

收稿日期:2025-08-12

作者简介:付冬生,男,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抗战文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抗战大后方旧体诗词的文献整理与研究”(24XZW021);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点研究基金项目“抗战时期重庆诗词文献整理研究”(22SKJD071)。

《诗叶》等刊物的编刊实态关注不足。其三,社员旧体诗创作研究,除熊飞宇编著《田楚侨文存》外,对章士钊、沈尹默、潘伯鹰、乔大壮等核心成员的旧体诗尚无专论,相关研究多置于交游或书法语境中附带探讨,未能独立揭示其诗学价值与艺术成就。其四,交游与雅集研究,如苟君《潘伯鹰与饮河社诗友的诗札往来》、邓云乡《“老虎总长”章士钊与沈尹默的私交风度》等,虽呈现部分人际网络,但缺乏历时性梳理与整体性观照。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呈现“重书法交游、轻诗词本体”“重个案描述、轻系统建构”之倾向,尚未形成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整体性成果,尤缺诗社旧体诗的艺术风格、思想内涵与文化功能研究。本文拟从诗社概貌、创作实绩及旧体诗艺术风格等方面展开研究。

一、抗战时期的饮河诗社及《饮河集》

饮河诗社,亦称岷江文会,是抗战期间致力研究与创作旧体诗的文学社团,“诗社由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江庸等人发起,1940年创办于重庆”^{[1]42}。据《沈尹默年谱》记载:“与章士钊、乔大壮、江庸等发起组织饮河诗社,章士钊、江庸任社长,社员有叶恭绰、俞平伯、朱自清、缪钺、叶圣陶、郭绍虞、谢稚柳、谢无量、马一浮等。”^{[2]395}其中,潘伯鹰任主编,许伯建为助理编务。

(一) 饮河诗社:民间诗社组织的新形态

诗社名源于《庄子·逍遥游》——“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寓意取益适中,贵在精纯。1944年2月27日《中央日报》第六版《饮河集》刊《引》一文,阐述“饮河集取义于庄子饮河满腹之意。世间好诗,有如河海。这小刊品,只能登载最少的一部分”^[3]。无结社仪式,未立章程,诗社以松散开放之态广纳各方文人。据苟君回忆:“最初其组织较为松散,没有什么社章及入社手续,并未开过正式成立大会,社员也未作登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潘伯鹰主编的《饮河集》为园地。”^{[4]111}诗社规定,凡在《饮河集》发表作品者,自动入社,无需申请,还声明:“《饮河集》无门户宗派之见。甚盼国内外同文投稿。”^[5]随后,诗社发展为重庆最大的旧体诗社团。1948年8月1日,诗社正式立案,登记52人,到会30人,若算上《饮河集》《诗叶》《饮河》渝版全部作者,社员逾百人。许伯建曾手书《赠答师友题名》,初列章士钊、潘伯鹰、朱守一等,后增沈尹默、胡惠溥;另含朱自清、缪钺、游国恩、马一浮、萧涤非、汪东、程潜、成惕轩等,构成饮河诗社核心阵容。黄苗子回忆:“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空袭频繁的年代,人们生活困难,文人们聚会一起,是‘穷作乐’,曾履川一个人住在张家花园下,房子很大,又烧得一手好菜,一有号令,朋友们都会去捧场,实则是‘蹭饭’。”^{[6]118}诗社以弘扬抗战精神为旨归,社刊《饮河集》专载相关旧体诗,并藉“批评”“介绍”“解释”等栏,倡导诗学理论,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论旧体诗之承续必要。

新与旧没有显然的界限;新体之成,非任何一二人的努力所能为功,几乎必须百年以上的诗潮涵演;旧体之蜕化,非任何人所能阻止,也非任何人所能催促,其次,从这历史的观点,诗的内容必然会反映时代,也必须反映时代。在这意义之下,形式技巧,成为次要的问题。然而这句话不是躲懒不用功的人所能藉口,因为在诗的历史上没有躲懒不用功而能立足的例。……我们尊敬那些烽火中捐躯卫国的英雄,因之益觉不应只以空骂几句倭奴浮喊几声杀敌,为已尽其天职,而必须以默默不息的工作去追配他们!我们相信这样笃实践履的志士,在今日我们这个剧烈战斗的国土中一定不少!以此历史的观点,和战斗的命运二者自勉,我们想尽力在中国诗上作一点工作。^[3]

饮河诗社另于《和平日报》刊发《饮河诗讯》,介绍其动态:

后来共赴国难的各方人士多了。许多老辈和青年,文官和武将作了许多激励抗战的诗。为了不由某一一人发表,所以“巧立名目”地取了“饮河社”一个名字。当时,在重庆土报纸上印的“饮河集”第一期中,便增加了一种“时代使命的敌忾同仇精神。”^[7]

饮河诗社倡导旧体诗承载“时代使命的敌忾同仇精神”,强调其不仅是历史回响,更应贴近现代生活,成为现代人情感与思想的表达载体。在此理念下,诗社赓续传统,融入时代精神,并倡导谦逊质朴的创作态度,敬守文脉,摒弃浮躁功利,推动旧体诗健康持续发展。

(二)《饮河集》:民间诗刊的现代实践

社刊《饮河集》连载于重庆版《扫荡报》《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益世报》《世界日报》副刊,至1949年11月停刊,共出九十期。初载于《扫荡报》副刊(1943年7月21日—12月8日),每十日一期,计十五期;1944年2月至5月迁至《中央日报》副刊,月出一期,共四期;同年6月起转至《时事新报》副刊,编辑部曰:“饮河集始刊于重庆扫荡报。继刊于重庆中央日报。自本期起在本报刊行。敝社同人未闻六义之微旨,辄有三迁之雅故,爰自本日改为迁字第一期。”^[8]至1944年10月,半月或月刊一期,共出七期;随后迁至《益世报》副刊(1945年3月—1946年5月),月出一期,计十三期。1944年2月27日,其于《中央日报》副刊第六版刊发《引》,正式提出编辑方针:“(一)论诗之作(二)并世诗篇(三)前辈未刊诗及事略(四)通讯。”^[3]这四项编辑方针标志着诗社选编策略的转变:由侧重抗战主题转向广采博取,体现了其在不同阶段对文学艺术的多元追求,旨在全面呈现旧体诗创作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抗战胜利后,饮河诗社迁沪,章士钊、沈尹默、潘伯鹰等核心成员同行。鉴于重庆为诗社发源地,许伯建提议保留饮河渝社。据苟君回忆:“在重庆的社员还剩有周邦式、杨元佛、朱梅迟、穆湘芷等,饮河渝社一直到1950年4月才解散。”^[9]⁸⁷ 饮河渝社持续推动《饮河集》出版与本地发展,并与上海总社密切联动,互刊稿件。《饮河集》分载于上海《京沪周刊》与重庆《世界日报》副刊,后者连载五十一期,至1949年11月停刊。这一历程彰显了诗社的持续活力,凸显了诗社跨域传播的韧性与文学生命力。

饮河诗社在渝的成立,是多重力量交织的结果:内迁潮与战时地缘优势提供了现实基础,诗人的旧学素养与结社传统奠定了文化根基,抗战宣传与“民族形式”倡导则创造了政治契机。诗社突破地域界限,汇聚本地文人与迁渝“下江人”,融合南北文风,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学共同体,为动荡时代的文人提供精神栖居之所。抗战期间,饮河诗社创作了大量饱含激情的旧体诗,既抒发忧患意识,彰显抗争精神,亦宣传抗战,使旧体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重获新生。

二、抗战时期饮河诗社的旧体诗创作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全国文化中心,诗人云集,共同缔造了独特的文化图景。曹经沅、贾韬园等诗坛领袖举办雅集,吸引饮河诗人等参与,诞生大量旧体诗。其中,以酬唱、赠答、咏怀为主。酬唱诗围绕特定情境唱和,强化诗人间的联结;赠答诗传递情谊与离思;咏怀诗则抒写个人志趣、生活体验与家国情怀,既展露才情,亦映照时代风貌。

(一)酬唱诗:情感交流与精神抚慰的韵语表达

抗战时期,饮河诗人积极参与雅集活动,创作了大量酬唱诗。饮河诗人藉此寻求文化认同与群体归属,抒发对安定生活及抗战胜利的期盼。此类诗作成为战时文人情感交流与精神慰藉的重要载体。例如,陈仲陶的《上已任园禊集未与分韵得俯字》:

江云晓未开,屋山鸠唤雨。
俊约负流怀,踏泥愁江浒。
因念过江人,清吟坐花墅。
平生爱晋贤,旷怀见谈吐。
庄老语自超,山水诗可取。
文字有真性,觞咏得高侣。
绵绵惬神理,乙乙抽妙绪。
千秋遗襖帖,影摄迭摩抚!
新亭景不殊,今昔一仰俯。^[10]

该诗开篇抒发未与襖集之憾,反衬雅集之重,凸显诗人对文会的珍视及其凝聚共鸣的文化吸引力。“文字有真性,觞咏得高侣”,揭示酬唱诗的核心价值:既为思想交流与诗艺品鉴之媒介,亦为切磋技艺、提升创作之途径。诗人借旧体诗抒怀,于吟咏酬唱中寻觅同道,构建跨越时空的精神联结。诗中今昔对照,融入深沉的文化记忆,在战时语境下,更凸显其赓续文脉、凝聚心志的文化传播功能:“风气之美,千载而下,犹令人想慕弗衰,虽非自造篇什,而断章取义,亦足以寄义托情。使非诵习娴雅,何能雍容若此?”^{[11]46}类似还有:许君武《癸未四月同文展上已修襖于渝州江楼愚因事未与友人代拈得带字》、徐曼略《伯鹰集同人宴饮再叠韵奉酬并简诸公》、曾小鲁《蟬堪招饮村居归途得二十韵赋呈兼简同集》等。通过酬唱诗,诗社构建起超越时空的文人共同体,彰显其在战时语境下兼具情感互通、文化赓续与群体认同的多重功能。

旧体诗因创作圈子化、集团化与私人化特征,成为战时文人寻求文化归属与心理安全的重要载体。抗战时期,饮河诗人借雅集唱和纾解离乱之感,维系群体认同。例如,潘伯鹰的《次韵沈吴兴东川诗友合一首》:

至清山水音,丝竹不能过。诗人发谣吟,如水鸣其和。长沙(章行丈)涌奔泉,万壑千崖多。沈汪(旭初)澠与淄,映带霜台柯。乔翁(大壮)越溪洁,西施出苧萝。海角见曾子(履川),往往珠纷罗。刘(禺生)叶(元龙)扬秋涛,墨舞亦傚傚。美哉黄(苗子)与许(伯建),鉴湖月新磨。公子(蒋俊齐)抱芳恨,秋水摇菱荷。徐(曼略)陈(仲陶)劲风骨,寒溜穿高坡。我才若杯水,浮芥坳堂阿。远朱(守一)而近谢(稚柳),一勺尝之俄。东川诗友合,赖公为咏歌。安能转相告,共和如羊何!^{[12]141}

该诗介绍了社员的构成,描绘了战乱中文人群体相扶共济、甘苦与共的精神特质。“至清山水音,丝竹不能过”,以自然清音喻诗咏,凸显动荡时局中藉诗歌达成精神共鸣。“东川诗友合,赖公为咏歌”,既表达对诗友赓续唱和之感念,亦体现诗在凝聚跨地域诗人、建构文化记忆中的枢纽作用。此诗为雅集实录,更是战时文人坚守文化道统、维系群体认同的精神写照。

作为情感纽带,酬唱诗不仅有效维系着诗人的社交网络,深化彼此间的情感联结,更成为促进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为集体创作与社会互动提供了持续而稳定的平台。正如有人所言:“酬唱诗歌正是中国这个几千年以来形成且沿袭不断的‘关系本位’社会状态的艺术反映。”^{[13]71}酬唱吸引不同文人参与,增强了诗社的凝聚力与包容性,使其成为多元共生的文人社群,推动了旧体诗的传承与发展。

(二)赠答诗:情谊传递与心灵慰藉的诗性共鸣

饮河诗人的赠答诗寄托了敬意与离思,在动荡时局中提供精神慰藉,促发情感共鸣,深化了诗人间的友谊。孙志军曾说:“旧体诗言简意赅,优雅含蓄”“表达特殊的情致。”^{[14]112}例如,徐曼略的《夏日山居三首兼简仲陶》:“赤日下高冈,细雾晚泱泱。林端见层峰,白云起更奇。山中能怡悦,蘋望惬所思。

虽非西来意,桑宿遂在兹。”^[15]诗人描绘了夏日山中晚景,从白日的炽热敞亮到夜晚的朦胧清幽,通过远近、动静的意象转换与交融,营造出对立统一的美学意境。“山中能怡悦,蘋望惬所思”,既抒写隐居之乐,亦遥寄友人仲陶,体现赠答诗的情感互通。全诗借景酬答,寄闲雅之趣,于简淡中见精神相契。

赠答诗以情韵兼具的抒情结构,不仅深化了旧体诗的艺术表现力,也拓展了其文化意涵与社会联结功能,对传统文人而言,“与友人通信探讨旧体诗创作是他们重要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享受”^{[16]36}。例如,郭沫若五十寿辰之际,沈尹默作诗相赠:“吾爱郭夫子,耽思入反听。精粗疏古事,新旧立今型。已讶多文富,还能大户醒。行途刚半百,珍重鬓毛青。”^[17]该诗赞其才学,并勖其惜时续创。郭沫若作答谢诗:“久不见君子,茅心愈重听。携儿过歌乐,握手接仪型。尘网经年密,清谈片刻醒。山头松柏翠,未逮眼中青。”^[18]该诗抒发两人久别重逢之喜,寄寓对现实的慨叹与未来的期许。“尘网经年密,清谈片刻醒”,暗喻规制之严,凸显晤谈之可贵。两诗用韵相承,情感呼应,虽略具应制色彩,而情意真挚,动人心弦。正如白居易《与元九书》云:“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19]339}可见,赠答诗作为一种精致的沟通方式,深刻体现了以诗为媒的文人交际传统。

(三)咏怀诗:言志述怀与缘情寄托的互渗交融

“言志”与“缘情”在饮河社的咏怀诗中交融互渗,构建出融合个人体验、空间重构与社会想象的诗学空间。咏怀诗既展现诗人的自我意识与内心世界,又折射战时境遇中的精神抉择,归隐之思与家国情怀并存,凸显文学作为个体精神寄托的深层价值。例如萧涤非的《早断》:“好去娇儿女,休牵弱母心!啼时声莫大,逗者笑宜深!家国原无恨,苍天不雨金。修江与灵谷,是而故山林!”^[20]诗中“原无恨”抒和平之愿,见情之深挚;“故山林”托宁静之思,寓志之坚定。全篇于动荡中寄寓心灵安顿之求,言志与抒情交融,展露出入世关怀与出世超然的复杂心绪。再看《村居杂诗》:“端居何怫郁,万念纷拏攫。天地发杀机,人命膏锋铎。斯时抱蠹简,六籍皆糟粕。剑亦不足学,学成苦相斫;古若不铸兵,争战何由著?”^[21]“剑”作为核心意象,象征战争与暴力;“苦相斫”刻画持剑互残的惨烈图景,既抒发对战祸惨烈的悲悯之情,亦揭示诗人对暴力根源的深刻反思。诗人归咎兵剑为祸始,言志于批判武力征伐,抒情于哀悯苍生,情志交融,展现出强烈的反战意识与人道关怀。

饮河诗人的部分咏怀诗细腻捕捉日常生活的宁静美好,抒发诗人对简淡生活的向往与闲逸之情。例如乔大壮的《病作》:“著书岁月堂堂否。聚米山川了了非,一笑明灯破乡梦,锦江桥下钓鱼矶!”^[22]该诗抒写病中诗人对故乡的深切怀恋,以及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与感怀。再如章士钊的《窗外》:“窗外池塘鼓吹哗,窗前小几胆瓶花。清谈有客供粽笋,病渴无心辨斗茶。”^{[23]43}诗人以白描手法勾勒窗外景致,借鉴古典园林框景意趣,将池塘定格为生动画境。病中静观闲谈,流露出对宁静时光的珍重。饮河诗社咏怀之作多取生活即景,借独特审美视角传递时代意蕴。表面看,吟咏唱和、写景抒情,呈现高山流水之逸趣;实则由心而发,于日常中探寻战时生存意义与精神安顿。

饮河诗社的旧体诗兼具个人与家国关怀,在写实与抒情、具象与抽象之间寻求平衡,精准把握时代脉动,体现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诗作超越个体情感表达,成为战时文学与文化的见证,承载集体记忆与历史反思。

三、抗战时期饮河诗社旧体诗的艺术风格

饮河诗社的旧体诗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常以“黄桷树”“雾”“防空洞”等山城意象揭示战争的残酷、民生的疾苦与个体的生存困境。饮河诗人众多,风格各异,审美多元,在深化“学人之诗”现代内涵的同时,展现出兼容并蓄的艺术格局。抗战语境下,其诗风沉郁悲壮,既展现文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责

任,亦折射对国运的深切思考,体现了时代风气对文艺创作的深刻影响,正如钱钟书所说:“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24]¹

(一)“山城意象”:地域文化诗意下的新表达

饮河诗人汲取山城民俗灵感,融地域精髓于旧体诗创作。其诗既描绘重庆山水的绮丽与雾都的朦胧,展现自然神韵,又映照民众坚韧精神,呈现出浓郁的地域风貌与鲜明的时代气息。章士钊《和翊云花茶韵五首》诗云:“巴蜀自来尊汉腊,文章何忍说新家。”^[23]²³ 抗战时期,迁渝文人并未因地域变动而疏离巴蜀文化,反而与之产生深层共鸣。诗人以旧体诗描绘巴渝独特的地理风貌与生活图景,表达文化认同。

黄桷树作为重庆的文化符号与集体记忆载体,其下的品茶、纳凉、闲谈等日常场景构成市民生活与情感体验的重要部分。浓郁的地方特色感染“下江人”,并激发其创作,黄桷树遂成为文化认同与诗意表达的重要意象。受此启发,江庸作《黄桷埡》,诗中“黄桷漫山最不材,浓阴匝地胜榆槐”^[25]⁹⁷,描绘黄桷树遍布山野之景,虽称“不材”却枝繁叶茂、广覆成荫,凸显其庇护价值,表达由衷赞美与欣赏。

重庆地形封闭,水汽丰沛,多雨易雾,独特的气候特征深刻影响南来诗人的创作,雾遂成为饮河诗人笔下常见意象。章士钊《南岸》:“访友巴山岭,云深未许开。渡喧催浪急,月小代星来。(此景唯四川有之)青嶂双流合,朱楼两岸排。隔江灯火盛,恍自九龙回。”^[23]⁴⁴ 前两句描绘南岸江峡云雾缭绕、山势险峻,月如星垂的夜景;后两句以江流与楼影的动静对照,勾勒出生动江景,触发诗人对香港九龙的忆念。潘伯鹰《佩弦以长诗述清华园旧事仆曩亦常游园韵因效之》诗曰:“渝江六月苦蒸热,鬼车日日乘长晴。汗流出入厌幽隧,百体困顿忘昏明。”^[12]⁹⁵ 此诗记录重庆六月无雾时敌机轰炸之惨状,揭示酷暑与战火叠加下民众的深重苦难,既表达深切同情,亦折射战时山城百姓坚韧不屈的精神。江庸《偕内子探梅王园,再用东坡〈松风阁诗〉韵》诗云:“渝州多雨少晴霁,失喜三日觐朝曦。西蜀梅花胜吴越,花亦感叹君知言。”^[25]¹⁰⁵ 诗中描绘重庆雨季云雾绵长之貌,对比巴蜀与吴越梅花,盛赞巴蜀梅花更胜一筹,借以象征诗人身处逆境而愈显坚贞的品格。

防空洞亦为饮河诗人笔下常见的意象。例如沈尹默《游四门》:“一声警报起悠悠,空袭又临头。防空洞里相厮守,也算是同舟。恨!百世不能休。”^[26]¹¹³ 诗人描绘大轰炸场景,生动再现避难时的狼狽与恐惧,展现文人前所未有的心理体验。空袭时民众涌入防空洞的描写,真实反映战时生存境况与民众心理,既揭示战争的直接破坏,亦暴露其深重的心理创伤。“恨!百世不能休”一句,抒发对侵略者绵延不绝的愤恨。总之,“无论是陪都重庆这一文学形象所显露出来的阴森,还是陪都气象的阴霾与山城意象的阴沉,实质上是基于战时生活的负面现实”^[27]¹¹³。

“黄桷树”“雾”“防空洞”等山城意象在饮河诗社旧体诗中具有核心表意功能,不仅拓展了诗歌内涵,亦成为情感抒发的重要载体。此类意象深刻体现了沉郁顿挫的诗风:黄桷树根深叶茂,象征坚韧生命力;浓雾弥漫,渲染压抑迷茫之绪;防空洞则浓缩战时生存的恐惧与不安。诗作根植巴渝文化,兼具鲜明地域特色与深厚人文底蕴,将战争惨烈与民生苦难融入含蓄深沉的书写,既呈露个体忧愤,也成为民族抗战历史的有力见证,彰显传统诗学在战时语境中的延续与转化。

(二)“学人之诗”:承古韵而赋新声的新特质

面对国难与个人际遇的双重挑战,饮河诗人深感文化传承之重任,致力于推进“学人之诗”的发展,其创作既体现对时局的深切关注,亦蕴含对家国命运的深刻思考。汪辟疆指出:“近代诗家,承乾嘉学术鼎盛之后,流风未泯,师承所在,学贵专门,偶出绪余,从事吟咏,莫不熔铸经史,贯穿百家。”^[28]¹⁴

饮河诗社中,章士钊、马一浮、江庸等兼具学者与官员身份的诗人,突破传统“言志”“缘情”范式,融

理性思辨与审美情趣于一体,于旧体诗创作中另辟新境。其诗学取向承续同光体“不墨守盛唐”、重宋诗风骨与思想性的主张,强调知识性与理趣。部分诗人属甲寅派或学衡派,如章士钊专力宋诗,诗风严谨清晰,以理入诗,彰显学术与诗词的深度融合。

齿有剥落处

行严

齿上有积石,往往得崩剥。小时不解事,辄谓齿身豁。
老来见理明,一发仍错愕。习洼忌地平,久暗憎光灼。
从来相处厚,弊害亦不恶,况非附骨疽,病止益秽浊。
人生何不容,区区齧与齧?谁肯乞巧迎,妄效山骨斫?
相依终未嫌,自去还欲遏。花随流水尽,题处红难没。
平居任天行,矫激不可学。吾薄白乐天,折杨兼卖骆。^[29]

章士钊由牙齿积石崩剥联想到人生变迁与世事无常,体现其善于从日常琐事中提炼哲理、以小见大的创作特点。“况非附骨疽,病止益秽浊”以齿疾喻人生小患,贴近生活而富含理趣,承袭宋诗“以俗为雅”“以物喻理”之风。“人生何不容,区区齧与齧?”以平实语言表达对琐碎困顿的包容,彰显从平凡中体悟生活智慧的“学人之诗”特质,契合宋代文人注重细节、寓理于常的审美传统。

曾履川师从同光体陈衍,属桐城后学,其诗亦有此特点。例如《题彭醇士所画朴园书藏图》:“旧学抱经鱼豕业,新题戢翼凤惊音。缥湘记共残峰隔,挂梦淞波一往心。”^[30]诗人善用奇字僻典,追求瘦硬意境,体现出对同光体宗宋诗风的承袭与延续。如其所言:“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31]³⁸ 缪钺诗《十二月廿五日访萧仲圭》云:“已淡世情容自乐,相欢朴学得常论。山城雨霁寒初透,老树枝空鸟不喧。十日病中有新悟,欲因暇日向君言。”^[32]该诗流露格物致知的学者习性。抗战语境中,饮河诗社强调诗歌的社会担当,借旧体诗记录苦难、抒怀家国,赋予传统诗学以新的实践意义。

饮河诗社继承宋代“学人之诗”传统,将儒释道思想融入诗中。初入蜀地,马一浮《凌云寺》写下“偶来石火光中住,闲踏毗卢顶上行。定后佳兵春雨迹,花前古帝杜鹃声。九峰力捍双江合,万木深环一塔明。不见桃花见流水,几人树下悟无生”^[33]⁵⁹⁻⁶⁰。首联与颔联借景抒怀,抒发对国土沦陷、战祸未息的悲痛;颈联以山峰隐喻前线将士守土之志,彰显其英勇抗敌为后方赢得安宁。尾联融禅理于诗意,展现乱世中内心的宁静与超脱。类似还有《即事》“铃铎传胡语,儿童学楚歌。崎岖百战地,羁旅一身多”^[33]¹¹³;《寄怀老友谢无量》“乱后亲朋多海峽,梦中鸾凤尚峨岷。遥知大药初成候,恍许遗书问谷神”^[33]⁶³;《次韵大无量见怀》“清都恒梦化人居,八表神鸾尚滞予。怒触山摧皆幻业,垂芒业见是真书”^[33]⁶³。马一浮常以冷僻典故起兴,体现其对玄学、神话的兴趣及对“正音正义”的追求。江庸诗作则用词精妙,意境纯净,诗意细腻,彰显典型的“学人之诗”特质。如《雨后过清水溪》:“雨霁沿溪草色娇,奔腾雄瀑下山腰。行人见惯浑闲事,一瞥匆匆过石桥。”^[25]⁹⁸ 该诗语言简朴,意境流丽,气韵清朗,绘就一幅清新质朴的雨后天景。正如刘士林论20世纪“学人之诗”所言:“学人之诗乃是现代学人生命整体的一有机部分,在其中不仅包含了传统的文史知识或诗学经验,而且尤其包含了传统学术和学者在现代社会中所获得全部丰富内容。”^[34]²³⁻²⁴

饮河诗人对“学人之诗”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战时知识分子对文化使命的自觉回应。该传统承自清末同光体,强调“以学问入诗”,融学术素养与思想深度于一体,重理性、尚典故,反对空泛抒情。饮河诗人在此基础上,强化旧体诗的社会功能,将其转化为文化抗争与精神坚守,借诗记录苦难、抒写家国情怀,并融入山城意象,赋予传统诗体以现实关切与时代新质。

(三)“沉郁悲壮”:抗战语境中诗风的新变化

饮河诗人深受诗词传统熏陶,已非囿于旧学的传统文人,而是在新旧交融中兼收并蓄,既承续古典美学精髓,又融摄现代学术思想,在守正与创新间寻求平衡。抗战期间,文人西迁与“衣冠南渡”形成历史呼应,南渡叙事被激活。饮河诗人借旧体诗书写流徙避难经历,字里行间充盈忧患意识,展现了“沉郁悲壮”的诗风。正如刘奎所说:“南渡不仅是独特的历史经验,也是一种特具内涵的叙述结构和出处方法,背后关联的是士人如何应对乱世的思想模式、道德伦理、情感结构和行为模式等。”^{[35]135} 饮河诗人亦是如此,陈寅恪《七月七日蒙自作》感慨:“南朝一段兴亡影,江汉流哀永不磨。”^{[36]23} 吴宓《大劫一首十二月二十四日》感叹:“绮梦空时大劫临,西迁南渡共浮沉。”^{[37]328} 诗人借南渡历史寄托忧思,以政治中心南移与士人流离的象征,寻求危难中的精神支撑。援引悲剧历史,既显历史之重,亦透出现实之悲;异乡的陌生与疏离,更加深了诗人对故土的眷念。章士钊的《和翊云病中答山腴》“欲从绮季称芝叟,更伴严陵作钓家。陡忆昔年烹鲤地,可堪重问旧京华”^{[23]53},情感亦是如此。面对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富有责任感的饮河诗人关注民族存亡,忧心故都沦陷之痛。诗句《南泉归后书感》“寥落渝州难自遣,更愁斜日对春华”^{[23]56}、《得伯鹰书感赋》“垄头松楸稻芟翦,里巷儿孙饱浪流。报国只须馀涕泪,还乡何暇计园丘”^{[23]80-81},都将沉郁悲壮漂泊感与爱国情怀结合,抒发内心压抑和孤独的情感。可见,这一时期旧体诗歌的内容“无论是直接写战争还是间接写社会生活,都与深重的民族危机与民族解放斗争相关,大多表现出作者的爱国挚情与忧患意识”^{[38]90}。

重庆大轰炸的残酷现实,使饮河诗社的旧体诗呈现出深沉基调,其中“轰炸诗”更显沉郁悲壮之风。“从某种意义上讲,战时语境下的旧体诗词具有特殊的史诗价值”^{[39]31},章士钊、沈尹默等亲历重庆大轰炸,悲痛尤深,如《日暮吟》:“东城西城火光迸,秋井塌处白骨埋。可怜无人掘秋井,三日白骨生青苔。天阴鬼哭影戢戢,瓦砾处处森成堆。”^{[23]26} 该诗描绘轰炸后尸骸遍野、满目疮痍的惨象,痛斥日军漠视人道、狂轰滥炸暴行。沉郁悲壮之风,既是诗人对同胞苦难的悲鸣呐喊,亦凝聚着民族的集体创伤记忆与不屈抗争精神。章士钊的《海棠溪》:“纵横肩毂沾泞泥,海棠不见见人啼。昨夜虏阵横空飞弹子,渝州一城声尽死。”^{[23]39} 诗以冷峻笔触描绘大轰炸后惨象,昔日海棠盛景荡然无存,城市化为废墟,揭露了侵略者暴行,字里行间充溢痛恨之情,风格沉郁顿挫,力透纸背。正如李遇春说:“其抗战诗词沉郁顿挫,学杜诗辛词但又不为其所拘囿,而是融入了一个现代自我在其中,化古为今、融今入古,故不失为别具一格之章诗章词。”^{[40]230}

四、结语

抗战时期,饮河诗社以旧体诗为载体,融合巴渝地域风貌与抗战现实经验,形成沉郁顿挫、兼容并蓄的艺术风格。诗社承续同光体格律之精严,立足“学人之诗”传统,融汇儒释道思想与学术修养,在古典形式中注入时代忧患与山城意象,使嘉陵江雾、佛图关月、防空洞生活等升华为具有文化厚度的诗意表达。相较怀安诗社侧重以通俗化、现实化的旧体诗激发民众抗战热情,强调社会动员功能,饮河诗社则更重文化守成与精神超越,凸显学术品格与地域自觉。如果说怀安诗社代表旧体诗的“大众化”取向,重在宣传鼓动;饮河诗社则体现“学者型”文人的坚守与重塑,重在文脉赅续。二者风格各异,却共同拓展了旧体诗在民族危难中的表现力与功能边界,彰显了传统文学在现代危机中的多元回应。

饮河诗社的文学实践本质上是一场以诗为盾的文化坚守。它表明,在民族存亡之际,旧体诗不仅是抒情言志的工具,更是维系文化命脉、抵抗精神沦陷的重要力量。诗社通过“学术性”与“地域性”的双重建构,实现了传统诗学的创造性转化,赋予旧形式以现代精神深度。其创作超越个体抒怀,升华为文

化自觉的象征——在炮火中守护文心,在流离中延续道统。因此,饮河诗社不仅代表战时旧体诗创作的高峰,更树立了知识分子以文化抗争回应时代危机的精神典范。

[参 考 文 献]

- [1] 许伯建,唐珍璧. 饮河诗社史略[J]. 文史杂志,1994(2):42-43.
- [2] 酆千明. 沈尹默年谱[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
- [3] 饮河社·引[N]. 中央日报,1944-02-27(6).
- [4] 苟君. 潘伯鹰与饮河社诗友的诗札往来[J]. 中华书画家,2017(5):111-115.
- [5] 饮河社·小启[N]. 扫荡报,1943-07-21(4).
- [6] 张南. 土纸本谈屑(内刊)[M]. 重庆:沙坪坝教育博物馆,2017.
- [7] 记者. 饮河诗讯的由来[N]. 和平日报,1948-08-21(5).
- [8] 饮河社. 移刊启事[N]. 时事新报,1944-06-15(4).
- [9] 苟君. 文字腐心吾未悔 朝华谢处计原非——许伯建诗词史迹初探[C]//二十世纪以来诗歌体式互涉研究——第五届“雅韵山河当代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刊). 中华诗词研究院,2018:76-94.
- [10] 陈仲陶. 上巳任园楔集未与分韵得俯字[N]. 中央日报,1944-04-23(6).
- [11] 刘永济. 十四朝文学要略[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 [12] 潘伯鹰. 玄庐隐诗[M]. 刘梦芙,点校. 合肥:黄山书社,2009.
- [13] 吕肖奂,张剑. 酬唱诗学的三重维度建构[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71-79.
- [14] 孙志军. 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15] 曼略. 夏日山居三首兼简仲陶[N]. 时事新报,1944-08-18(4).
- [16] 付冬生. 抗战时期老舍“人名诗”创作考论[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9):32-46.
- [17] 沈尹默先生赠郭先生寿[N]. 新华日报,1941-11-16(3).
- [18] 郭先生步原韵谢沈先生[N]. 新华日报,1941-11-16(3).
- [19] 白居易集[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 [20] 涤非. 早断[N]. 时事新报,1944-07-15(3).
- [21] 泽承. 村居杂诗[N]. 时事新报,1944-10-03(4).
- [22] 大壮. 病作[N]. 时事新报,1944-07-01(4).
- [23] 章士钊诗词集 程潜诗集[M]. 陈书良,胡如虹,编校.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 [24] 钱钟书. 七缀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25] 江庸. 江庸诗选[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26] 沈尹默. 游四门[J]. 中国青年(重庆),1939(1):113.
- [27] 郝明工. 陪都文学的书写意向与文化蕴涵[J]. 重庆社会科学,2013(1):110-115.
- [28] 汪辟疆. 汪辟疆说近代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9] 行严. 齿有剥落处[N]. 时事新报,1944-06-15(4).
- [30] 颂橘. 题彭醇士所画朴园书藏图[N]. 中央日报,1944-03-26(6).
- [31] 曹聚仁. 文坛五十年[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 [32] 彦威. 十二月廿五日访萧仲圭[N]. 时事新报,1944-06-15(4).
- [33] 马一浮. 马一浮全集:第3册(上)诗集[M]. 吴光,主编.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 [34] 刘士林. 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 [35] 刘奎. 诗人革命家 抗战时期的郭沫若[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36] 陈寅恪诗集·附唐筼诗存[M]. 陈美延,陈流求,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 [37] 吴宓. 吴宓诗集[M]. 吴学昭, 整理. 北京: 商务图书馆, 2004.
- [38] 胡迎建. 论抗战时期旧体诗歌的复兴[J]. 抗日战争研究, 2001(1): 85-100.
- [39] 付冬生. 独有丹青写史诗: 战时语境下的抗战旧体诗词创作[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26-32.
- [40] 李遇春, 李聪聪. “青桐”“孤桐”“秋桐”——章士钊旧体诗词创作流变论[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3(4): 216-238.

The Theory of Classical Poems Creation of the Yinhe Poetry Societ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Fu Dongsheng Yao Jiax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Chongqing with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osition, became the center of the Anti-Japanese cultural movement. The Yinhe Poetry Society was born in thi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oon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literary organization in the rear area of the war. This focuses on the literary practice of the Yinhe Poetry Socie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crisis, exploring its unique functions in war propaganda,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creation of classical. The central question is: how does the poetry society continue the traditional “poetry expresses aspirations”, and how does it express the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 with classical poetry. What kind of innovation does its work present in terms of artistic styl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cultural function?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method of documentary research, with *Yin Collection* as the core text, supplemented by relevant archives, poetry collection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sort out the activities of the poetry society and its creative achievement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highlight its characteristics by referring to other literary group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Yinhe Poetry Society has built a cultural community both literary and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its elegant gatherings and the continuous publication of the *Yinhe Collection*. Its crea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not only shows a distinct “mountain city”, vividly reproduces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and humanistic style of wartime Chongqing, but also inherits Du Fu’s “solemn and stirring” of poetry in spirit, strengthening the realistic orientation and historical sense of poetry. Especially prominent is that the poetry society deepens the tradition of “poetry of scholars”, casting literacy and patriotic feelings into the poetry, and its works combine academic depth with artistic appeal, showing a diversified aesthetic orientation. The literary practice of the Yinhe Poetry Society only expands the forms of expression of war literature but also maintains the pulse of national spirit on the cultural level, which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resistance during the war. This reveal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poetics in the modern context of national salvation,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versified appearance of war literature, and also provides a case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ld forms” and “new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Yinhe poetry society; classical poetry; mountain city image; the poem expressing aspirations; poetry of scholars

[责任编辑: 陈忻]